

前 言

中国的传统伦理学,无论同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比,都可以称得上是最有系统的学科之一。它形成最早,光彩熠熠,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精神宝库。它把人类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阶级意识、群体意识、家庭意识、他人意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和谐的、相互为对方着想、个人为国家着想、为民族着想,从而见义勇为、舍生取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稳定思想体系。

众所周知,当人类没有脱离动物之前,即人类社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人和动物一样,除了本能地寻觅食物,追逐异性以维持个人的生存以及生命的延续之外,是没有什么伦理意识的。那时候的人,完全受自然法则的支配。饿了,要吃;渴了,要喝;冬天寻找温暖;夏天躲避酷暑。长到一定年龄,就本能地追求异性。因为这个时候的人只知追求个人的欲望,在方式上同动物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把它称做还没有脱离动物的人的动物性。

当人类脱离动物,人类社会形成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一个人除了考虑自己的生存以外,还要考虑别人的生存。愈是考虑别人的利益多,就愈聪明、勇敢,从而受到人群的拥戴和尊重。这些人是人类的精英,他们代表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眼界更加开阔,从而考虑的范围也就愈广。大至全人类、全民族、整个国家或自己所属的阶级、集团;小至家庭、朋友、亲族。久而久之,人的身上出现了人

性，并逐渐形成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意识。

从伦理意识产生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个人言行中的动物性越少，人性越多，那么，这个人的境界就越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阶级、一个集团，甚至全人类都是如此。同时应该看到，伦理意识在每个具体人身上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有些人身上的动物性，或叫兽性，至今还没有消灭，甚至表现得还很顽强。它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极端的利己主义。地球上现存的侵略、征服、掠夺、奴役、剥削、屠杀等现象，从伦理学的角度看，都属于这个范畴。这些人私欲膨胀，无限制地放纵自己，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当他们没有权力的时候，表现为个人或团伙的抢劫、偷盗、诈骗、杀人、放火，不择手段地把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当他们握有部分权力的时候，表现为索贿、受贿、贪污、枉法，无休止地聚集属于他个人的财富。有的甚至为了个人或集团的利益，把整个国家、民族拖入战争的深渊，把亿万民众置于水深火热之中。如中国历史上的暴君夏桀、商纣，外国的战争狂人希特勒、墨索里尼，均属此类。另一种人，即能充分代表人的本质的人，他们努力修养自己，千方百计地克制自己的私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他人、国家、民族有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在处理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时候，先人后己，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成全别人。努力做到“忠恕”。生活中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最后达到“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目的。这种人做平民的时候，遵纪守法，靠诚实的劳动维持自己的生存。在为官的时候廉洁自律，克己复礼。象历史传说中的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傅说、皋陶、伊尹都属于这一类。这种人奉行的是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阶级利益为中心的利他主义，或叫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孔子称他们是“圣人”、“君子”、“善人”和“有恒者”。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人，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够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他们也就成了几千年以来支撑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脊梁和柱石。所以，如何消灭或减少、约束、限制个人的动物性或兽性，发展、扩充个人的人性，即培养个人的利他主义的道德品质，成了历代教化或教育的基本内容和宗旨。从而，利己主义或利他主义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区分善恶的重要标准。孟子所谓的“性善”，荀子所谓的“性恶”，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前者要求人们扩充天性中固有的善良的利他主义的一面，后者则要求人们克服天性中固有的利己主义的一面，最后，两者都要求一个人要不断修养自己的品德，以至于达到“至善”的境地。

在中国传统道德的形成过程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人类社会中的每一种人，不管他们处在什么地位，对其言行都有具体的约束和规定。首先，他们强调修身的重要。只有修身才能克己；只有克己，才能成己，才能“明明德”，从而使自己获得无我或忘我的利他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品质。有了这种品质之后，才能服务于自己的国家、民族、阶级，才能使家齐、国治、天下平。即他们所谓的“新民”、成物。《大学》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正是这种修身成己、成物的道理。显然，这里明白地提出了一个人只有先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即培养自己的高尚品质，然后才能去改造客观世界的命题。所以，修身非常重要。他们响亮地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口号。即只要是人，无论贵贱老幼一律应该修身。不这样，就不能使自己达到“至善”。所谓“至善”，即具有智、仁、勇这三种品质。只有具备了这三种品质的人，才可以称为人格完善的人。只有这种人才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堂堂正正，光明磊落，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无论走到哪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险恶，都能保有一种充沛的浩然正气。

儒家在谈到修身的目标,提出“智、仁、勇”三个标准之后,又提出了达到这三个标准的具体途径。即“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的理论。所谓好学近乎智,即通过勤奋的学习,使自己达到聪明、智慧,不断地认识、掌握自然、社会的运动发展的规律;所谓力行近乎仁,即通过实际行动为他人、为家庭、为朋友、为国家、为民族、为阶级、为集体,乃至为全人类做好事、善事,谋福利;所谓知耻近乎勇,即不断地反省自己,改正错误,使自己的思想更加符合实际,使自己的行为更加符合客观规律,在“兼济”或“独善”的生涯中少走或不走弯路。要做到以上这些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顽强的意志,锲而不舍的精神,没有这种意志和精神是不行的。然而,一个人怎样才能获得这种顽强的意志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呢?儒家认为只有“诚”才是它们的强大的动力。不仅个人正心、修身,培养自己的高尚品德赖此,而且国家之治,天下之平亦是赖此。在这里,“诚”是仁爱,是智慧,是力量和勇气。一个人只要有了诚,就可以在攀登光辉顶峰的过程中,不退缩,不气馁,最后一定成功。俗话说说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指的正是这种意思。

孔子及其弟子们吸收了我国各种学派有关这些方面的精华,创立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完整的伦理学说,发现了人与人应该怎样共生共存的原理。因此,“大成至圣先师”的称谓,孔子当之无愧。除上面谈到的智、仁、勇三纲之外,还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这三纲、八目涵盖了中华民族伦理学说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几千年来,它教育着中华民族的儿女们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鼓舞着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建设自己的美丽的祖国和家园,同时也告诉他们怎样去反抗压迫、侵略和奴役,并时时演出过一幕幕震惊世界的壮剧。

儒家所说的八目,实际上阐述的就是修身,即培养自己的方法

和目标。

一是格物。这里的“格”有推究、探索、寻求、通晓的意思。“物”即指独立于人的主观意志之外的客观世界。格物就是要求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必须研究客观事物，并且通晓它们的规律。一个人每天都要接触很多事物，其中有美有丑，有善有恶。有的可以裨益人的生活，有的可以荼毒人的生命。如果一个人能够正确地对它们加以认识、分析、判断，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叫做智。反之，就可以称做“愚”。如果能够利用规律，顺应规律，支配规律，趋利避害，从而造福于集体、国家、民族、阶级，甚至整个人类，这就叫做“巧”。反之，就可以称做“拙”。在残酷的社会、自然斗争中，智而巧者胜利，愚而拙者失败，这是万古不变的规律。不仅一个人如此，而且一个群体、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所以要做一个品德高尚的圣人、君子、善人或有恒者，或者说想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民族、人民的人，首先要做到智而巧。要做到智而巧，就得勤奋的学习和不断的实践。这里所说的学习和实践，不仅指不知疲倦地研读书籍，掌握前人已有的知识，而且指通过对客观事物的不断观察，了解社会和自然的法则，开创新的领域。然后，再把这些间接的或直接的知识付诸行动，加以验证。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最后把它们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如果一个人能够运用这些正确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那么他在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就会无往而不胜，所向无敌。然而，怎样才能对“物”做到“格”呢！《中庸》中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对人有很大的启发。这里不仅有广博地学，仔细地问，认真地思考，而且有正确地分辨，真心实意地实行。一个人如能做到这五点，并贯彻到底，真正做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那么就能够做到“格物”。从而，具有认识、掌握、运用客观规律，明确分辨事物善恶、是非、真伪、邪正的能力。

二是致知。所谓致知，即指一个人通过格物以及学、问、思、辨、行这些功夫所得到的知识。这里的“致”，依据汉代郑玄、宋代朱熹的说法有“来”、“求得”和“获得”、“寻求”的意思。这里的“知”，即关于各种事物存在、运动、发展、变化的知识。其内容极为广泛，最重要的可以概括为“三明”“五知”。三明即明道、明德、明教。这里的“明”字，有发扬、洞明、明察之义。这里的“道”，指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五伦）的理论。这里的“德”，指一个人应具有的智、仁、勇这三种美德。这里的“教”，指教化、教育。即一个人要懂得道和德，并贯彻于自己的行动之中，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实现。对于个人来说，则指刻苦修练自己的高尚品质。五知，即知天、知命、知性、知物、知人。知，可以理解为了解、通晓，“天”可以理解为人类生存的客观环境，即地球以及环绕地球的自然空间中的万事万物。大的包括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以及它们的性质。命，可以理解为万事万物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如天体的运行，四季的变化，生命的产生、成长、衰老的规律以及人类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及其历史，其间有一种人的主观意志不可左右的力量。所谓“知性”，性即为人生存之本能。这不仅人类具有，凡有生命的事物都是如此。只有认识本能，掌握本能，才能维持生命于现在，延续生命于将来。维持生命的最低条件是“食”“色”。所以《孟子·告子》说：“食、色，性也。”意思是说，吃饭、追求异性是人类自然生成的本性。所以，饮食男女，乃人之大欲。但是，如果一个人一味放纵这种本能的欲望，一天到晚，只知觅食求偶，那么，这个人实际上与禽兽无异。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除了食色之外，更重要的是履行仁义。当它和食色不能兼得的时候，应该放弃食色，甚至个人的生命，努力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儒家看来，对于食色和仁义的关系处理要恰到好处。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这就是“中庸”概念地具体运用。即既反对纵欲，也反

对禁欲,同时,把仁义放在第一位。使人与人和谐相处,从而达到共生共存的目的。所谓“知人”,乃是“三明”、“五知”的中心。因为了解和掌握各种环境与自然法则的目的在于知人。了解各种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目的在于了解如何为人,知性的目的在于了解与人相处的伦理;明道、明德的目的在于“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明教的目的在于知道如何教育人以及自己如何受教育。知人,要求了解人的特征、思想、感情,并能迅速判断一个人的好坏。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些呢?最重要的方法是不断对人的言行进行考察。考察他们对义与利、对修养品德、对所处地位、对处理矛盾冲突、对别人利益、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等方面的态度,分析他们在这些问题面前的表现,那么,这个人的好坏、高下就判然分明了。《孟子·万章下》中说:“夫义,路也;礼,门也。唯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所谓知物,即通晓万事万物的实质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并掌握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的特点,处理好本末、主次、大小、轻重、新旧、异同、得失、存亡以及贵贱、贫富、荣辱、穷达、毁誉、生死、好恶、去就、上下、远近、义利等辩证关系。从而把自己锻炼、陶冶、修养成一个品德高尚、知识渊博、智慧明敏、心存大公、行依于仁的人。

三是诚意。所谓“诚意”,可以理解为“使意诚”的意思。这里的“意”,指人的思想、精神、意志,属心灵世界的问题。因此,有“诚心诚意”的说法。这里的“诚”,指至诚、真诚、真心实意、心志专一等。《中庸》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这里所说的“一”,就是诚。可见,诚是一种推动力,属于人修养德行的动机问题,是获得高尚品质“五达道”、“三达德”的力量源泉。它贯彻一个具体生命的始终。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之前,都应该在使自己意诚的同时,确定前进的目标。然后,可以集中力量,向着理想不屈不挠地奋进。《大学》中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

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其中的“五个止”五种高尚的德行“仁、敬、孝、慈、信”，可以视为至善，它可以作为人们终生之依归，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就是儒家伦理学说中所说“立志”“知止”的具体含义。所以，“诚”除了是动力之外，又是信仰，又是仁爱，又是智慧，又是决心。一个人做到“意诚”之后，就是勇毅果敢，无坚不摧。他将会战胜任何困难和艰险，最后到达金光四射的理想的彼岸。所以《中庸》说：“至诚无息，不息则久。”总之，修养品德，“诚”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因为诚能见其真，成其大，尽其性。在这里，只有摒弃自欺、欺骗、虚伪、狡诈，始终表里如一，人前人后如一，才能尽万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成经国之大业。《中庸》中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智达天德者，其敦能知之”阐述的正是这种道理。可以说，诚意是修身的基础，是正心的前提，是修养品德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之一。

四是正心。所谓正心，就是使心正，或把心放正的意思。它的核心内容是排除各种杂念，使心归于正。我们知道，个人和人类所处的环境是复杂的。其中自然的和社会的事物千头万绪，纷乱复杂，他们之间也在不断的矛盾斗争中，相互影响，不断变化。即使人和人类本身也是如此。由于各种利害、思想、感情的不同引发出成千上万种意志、力量的冲突。这些客观的或主观的因素都会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这样，一个人的想法、做法随时都有改变的可能，因而，也就出现了正确与不正确的问题。所以，儒家提出了修养品德必须“正心”的主张。一个人坚持修身，就象一只船行走在大海中一样，只有掌好舵，时时调整方向，才能驶向目的地。心就是一个人走向预定目标的舵，只有不为外力所动、所移、所屈，才能沿着正确的航向，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地到达预期的畛域。然

而，人是有生命的，不可能不食世间烟火，更不可能没有喜、怒、哀、乐之情。如果，只凭个人感情去对待周围事物，难免会发生偏颇。《大学》中说：“有所愤懣，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这段话说明，一个人的心，如果受到忿怒、恐惧、好乐、忧患等情绪的影响，那么这个人的心就不会端正。怀着一颗不端正的心，肯定是无法区别善恶，分辨是非的。对其所爱、所敬的人，不管他们如何丑恶、拙劣，内心总觉其美善；反之，对其所厌恶的人，不管他们如何美善，内心总觉其丑恶、拙劣。结果，会产生偏见，颠倒是非。所以，克服感情的干扰，非常重要。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关系到修身的成败。此外，在不同的条件下，由于生理欲望的不同，也影响着人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孟子》说：“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这是说，饥饿的人以为食物的味道特别美；干渴的人以为水和饮料的味道特别美。至于食物、水和饮料的本身是否美，或美到什么程度，那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人的口腹尚有饥渴之害，那么人心怎么会无害呢？所以，能否制止自己的生理欲念，也是修身成败的关键之一。《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因为，寡欲可以减少外界的诱惑，同时增强克制欲念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把心放正，对人对事坚持原则，公平合理。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取和与、生与死、是与非、义与利的辩证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根绝四种思维中的毛病，从而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对人对事不存成见，不独断专行，不固执己见，更不能心目中没有别人，只有自己。努力做到以是非为是非，最后，成为天下维护真理、主持正义，堂堂正正、无私无畏的楷模。

五是修身。“修”是修养、修治、修练。身，在这里主要的不是指人的躯体，而是指人的躯体所产生的意识、思想、精神、品德、知识、智慧和能力。所谓修身，即要求每个人高度重视自己的品德修

养,从而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在儒家看来,修身的原则是“道”,道的应用自然不能脱离“德”。一个人只有在好学、力行、知耻这三个方面不断努力,才能获得智、仁、勇这三种品德。只有具备了智、仁、勇这三种品德的人才能建功立业,成就大事。《中庸》中说:“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儒家把这些人格完美的人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圣人。这类人具有掌握、驾驭客观规律的才识,并且有宽宏的度量,坚定的信仰,端庄的仪态以及高深的学问。这种人“言,而世为天下法;行,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代表人物有伯夷、柳下惠、伊尹、孔子等。第二类为君子。这类人德智兼全,重道轻食,勤行行道,不以贫穷为己忧,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不患生前不为人知,惟患死后不见称于世。平时,谨言慎行,以孝悌忠信为立身之本。言行一致,彬彬有礼。处世通达众务,力求笃实,信仰坚定,庄以持己。以成己成物为乐,不羡慕外来富贵。代表人物有臧武仲、孟公绰、卞庄子、冉求等。第三类为善人。这种人反对恶而提倡善,但因缺乏完善充实自身的力量,未能获得重大成就,然而却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好人。亦即孔子说的“不践迹,亦不入于室。”意思是说这类人不一定跟着圣人的路线走,然而天生的善性,自然不会去做恶,但因为不学的缘故,也不能进到圣人精微深奥的境界。代表人物有乐正子等。第四类为有恒者,这类人的特点是有恒心,有顽强的意志。做事有始有终,不屈不挠,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有恒心的人值得人们尊敬,因为这种人可以由愚蠢变为聪明,由柔弱变为强大。所以,无论是圣人、是君子,或是善人,关于有恒这一点,在他们修养完美人格的过程中,是必须具备的共同品质。因此,孔子把看见有恒者当成一件幸事。

儒家伦理学说讲了修身的原则、目标、标准之后，又详尽地阐述了修身的方法。概括起来有二十六种。一是立志。因为“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一个人做事需要如此，一个人的一生有意义地度过更需要如此。所以，立志为人生第一重要课题。二是好善。即平时心存公道，多做有益于别人的事。三是自勉自励，不怨天尤人。照孔子说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去做，生活中只考虑增长才干，修养自己，至于是否被了解、被重用，可以不去考虑。四是不欺人，亦不自欺，人前人后一个样儿。尤其当无人在旁，个人索居独处的时候，注意“慎独”二字，不要让不正当的想法和欲望冒头，努力做到克己自治。五是时刻省察自己的言行是否有错误。无则加勉，有则改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努力做到“见不贤而内自省”“见贤思齐”。六是时刻注意总结教训，做到“自反”。当做一件不如意的事情之后，努力寻找自身的原因，不要错怪他人。七是发现自己有过失有错误，既不掩饰，更不嫁罪于人。按“责己宜厚，责人宜薄”的原则办事，做到“自责”。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八是勇于改正错误。改过和文过是君子和小人的重要区别。改正错误，光明磊落；文过饰非，欺人害己。孔子说“过则勿惮改”，子夏说“小人之过也必文”，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等，这些古训至今有益。九是积极上进。如果发现自己才德方面不如别人，应尽力赶上。如有比别人强的地方，则应谦虚，时常保有不足之心。不骄傲、不妒嫉，把“满招损，谦受益”时刻铭记心头。十是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如果发现自己智力、品德、体力，即不管哪一方面不如别人，则下决心赶上。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有精卫衔木石，以填沧海的意志和毅力。十一是充满信心，从不自暴自弃。只要心常居仁，行常由义，总有一天会得到成功。十二是不汲汲于名利，无患得患失之心，胸怀坦荡，居安资深，穷达不计，悠然自得。

十三是能够吃大苦，耐大劳，以天下为己任，经得起痛苦的磨练。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大凡圣人、伟人都经历过一定的劫难。如“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等。十四是衣食住行重俭朴，有规律，廉洁自律，从不铺张浪费。孔子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十五是在重要关头，甚至需要献出生命时，能够保持高尚的节操。正象《孟子》一书中说的那样，“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十六是言行与自己所处的地位相称，取、与合乎礼义。精神方面不侮人，物质方面不夺人。从不以不正当的手段追求富贵，也不以不正当的手段摆脱贫贱。不卑不亢，安位守分。十七是没有过分的奢望，不羡慕他人之富贵。身处困境，仍能进退以礼，淡泊以明志，怡然而自乐。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十八是出仕慎重，去留合宜。环境有为时大干一番，无为时及时引退。不能混迹权臣之间，同流合污。孟子说的“所就三，所去三”，就是让人选择任职和去职的恰当时机。十九是对交际和取与要谨慎。社会上的人不是孤立的，彼此之间一定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其中朋友之间免不了会有馈赠。该给的给，不该给的不给；该接受的接受，不该接受的不接受，一切以礼义为依据，不能伤害廉洁和惠爱，更不能通过贿赂而满足私欲。《孟子·离娄下》说的非常明白“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二十是选择环境，改造环境。因环境可以影响人，所以注意修养品德的人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要进行选择和改造。尤其对周围的人的言行要进行考察，并加以分析，千万不能为谬误所惑，更不能受它们的支配和左右。二十一是在审时度势。即在做一件事之前，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认真考虑时间是

否合适,条件是否成熟诸项因素。如果时间与条件具备而不行动,则坐失良机,这叫保守。反之,时间与条件不具备时就开始行动,这叫盲目冒进。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该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不该动,要凭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进行准确的判断。《孟子·公孙丑》中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镞基,不如待时。”二十二是说话谨慎。做到言必忠信。防止空话、大话、虚话。即使正确的话,也要考虑什么时间说,说到什么程度,该对谁说的问題。听者有道,多言无妨;听者无道,少说为佳。以言取信,不如以事实取信。《论语·子张》中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二十三是行为谨慎。行为是一个人思想品德的具体表现。只有说到做到,言行一致,而且又合乎礼义,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此外,做一件事之前要考虑周到,绝对不能妄行或冒昧从事。因为这样会给个人、或天下百姓、国家利益带来巨大损失。二十四,尊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不仅学生应该尊重老师,全社会都应该这样做。尊师的目的是为了重道,而老师则是知识、道德、品行的继承者、传播者和体现者。《孟子·万章》中说:“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可见,老师是先知先觉者,他们用大道教育天下人,所以老师应当受到天下所有人的尊重。二十五,对朋友要讲信用。朋友为五伦之一,相互应讲一个“信”字。交友的目的是为了辅仁,互相鼓励做好事、善事。交友要交益友,相互尊重,朋友有错时,努力劝阻。《论语·季氏》中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这段话,讲的正是交友的原则以及该和什么人交友的问题。二十六是忠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概括起来无非是对己对人两类。平时为人应以利人为主,不能损人利己,更不能损公肥私。对人对公应以奉献为主,努力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一个字概括即是“恕”。恕包

括的内容很多,如居上不骄,居下不倍,不伐不求,不道人短,不矜己长,不念旧恶,不咎既往等。对人存有侧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论语·卫灵公》中说的“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种理论的高度概括。《论语·里仁》记录说:“子曰,参乎?吾道以一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以上诸项,归纳起来,其实只有四个字,即“克己复礼”。克己,指克服或克制天性中的弱点,如私人占有欲、名利欲、权力欲、支配欲等利己主义的表现;复礼,指自己的言行完全合乎为他人、为集体、为国家、为民族、为阶级谋福利的准则。最终达到智、仁、勇兼备,成己成物,兼济天下的目的。

六是齐家。在儒家看来,一个人成己之后,开始成物的时候,首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这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治国必先齐其家”的基本道理。因为一个掌权者,或者说一位君主,一位宰相,或其他大臣,他们必须具备天下人最好的道德品质。只有这样,才能被亿兆民众尊重和敬仰,才能做到“不令而行”。反之,一位连自己的家都管理不好的人,要想把一个国家治理好,则是不可能的。最后,恐怕也只是一句空话。《大学》中所说的“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讲的正是这种观点。这就告诉人们,成物的进程必须由近及远,即实践修身的理论,必须从自己的身边开始。

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活中出现了家庭。这种组织形式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依据血缘的远近,产生了丈夫和妻子,父母与子女,子女和子女等关系。从而,怎样处理好这些关系,成了家庭伦理探索的重要课题。传统的伦理理论把人的关系分为五种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家庭中却占有三种。所以,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在处理好人与人关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虽然时代发生了变化,然而,在家庭还继续存在的时

候,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仍然是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学不可忽视的内容。同时,家庭能否和睦,亦是社会秩序能否稳定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因素。

在人伦未明的时代,男女之间的关系跟动物相差无几。生命的延续,男女的性行为,仅仅凭着性欲和力量来支配,不讲感情,不讲礼义,同时,也没有固定的形式,子女只知何人为母,不知何人为父。这时的家庭关系根本无法确立。随着文明时代的产生,夫妇关系相对地稳定下来,爱情和道德的观念在人们的生活中有了一定的位置,这时,家庭伦理关系才逐渐得以确立,而夫妇则为人伦的发端。所以,处理好这种关系非常重要。传统的伦理观念主张婚姻要严肃,不能象禽兽那样忽聚忽散,既结为连理,就要天长地久,善始善终,各自尽到应尽的责任。《诗经·小雅·棠棣》说:“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夫妇之间应该相敬相爱,和好相处。只有这样,子女才能在快乐与幸福的环境中成长。对待老人应该孝敬。这样做了,家庭自然就会团结,一个团结的家庭自然会有凝聚力。这样的家庭,必然是蒸蒸日上,事业有成。另外,在处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时,首先父母对子女要慈爱,而子女对父母要孝敬。《大学》中说:“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乎慈。”可以说是处理好这种关系的基本原则。父母是子女生命的本源,而且又是自呱呱坠地直到长大成人的抚育者和教养者,千辛万苦。所以子女孝敬父母天经地义。尤其父母年老之后,子女倘能心存其仁,行存其敬,对父母仍不失赤子之心,这就叫做“大孝”。孝亦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对父母不孝敬,甚至虐待、歧视、遗弃,这种人的实质恐怕同禽兽不会有什么差别。这里所说的不孝有五个方面。一是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二是博奕好饮,不顾父母之养;三是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四是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五是好勇斗狠,以危父母。这里所说的“孝”亦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在思

想感情和精神上要爱要敬；二是把物质供养和精神上的尊重、安慰结合在一起；三是去除一切不良习惯，不致因自己受辱或受害而连累父母；四是保重身体，不让父母担心；五是劝谏父母时，态度要和顺，父母去世后，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祭祀，以示自己对父母的追思和怀念。

在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儒家提倡“悌”。所谓悌，即兄爱弟，弟敬兄，姐妹之间亦应如此。

五伦中除夫妇、父子、兄弟这三种家庭内部关系之外，还有君臣、朋友这两种。即对国家（亦指君主）要忠，对朋友要信。然而一个人要做到这两点并不是很容易的，只有在认真修养自己，管理好自己的家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一旦家庭利益、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恐怕更需要舍生取义的奉献精神。毫无疑问，这种奉献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它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奉献精神不仅同它没有矛盾，反而是它，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继续。

七是治国。所谓治国，就是把国家治理好的意思。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很发达，数千年来，有着许多伟大的创造和发明。其中，如何治理好国家的经验特别丰富。儒家把它概括为九条。这九条具有普遍性的经验，古人称为“九经”。一是修身。即当权者，尤其是最高的当权者不仅智、勇过人，而其德行尤须成为民众的表率。二是尊贤。因为治理好一个国家，当权者的贤明固然重要，然而股肱的忠良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求才为第一要务。如能做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那么国家就可以垂拱而治。三是亲亲。所谓亲亲，指从政、当权的人首先做到孝和悌。使自己的家形成和谐与亲爱的环境，每个成员，包括子女，都能通情达理，廉洁自好，奉公守法。所以，孟子说：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四是敬大臣。指君主、或最高的当权者，必须尊重大臣的意见、人格。不能随意怀疑、侮辱，更不能无故屠戮与株连。君臣之间只有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国家才能治理好，才能知人善任，因材施教，信赏必罚。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五是体群臣。这里所说的群臣，指国家各级官吏。不管职位高低，他们对政令的推行都起着一定的作用。所以，君主、或最高的当权者对他们应该一视同仁，并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给以慰勉和关怀。六是子庶民。这里的“子”是意谓性动词。即在感情上对待民众应象对待自己的子女那样。也可以说成是把民众当成自己的子女对待。要求当权者，尤其是最高的当权者对百姓要爱护。大禹、文王是这个方面的典型。《孟子·离娄下》说“文王视民如伤。”《论语·泰伯》说：“禹，吾无间然矣。”前句是说文王害怕人民有痛苦，把百姓的痛苦，看成是自己的痛苦。后句是说，在爱民方面，大禹实在完美，我实在是找不出可以指摘的地方了。七是来百工。所谓来百工，指除了搞好农业以外，要提高生产力，还要大力发展手工业、工业。《考工记》中说的“铄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发展农业、工业，尤其是工业，国家才能强大，百姓才能致富。八是柔远人。所谓柔远人，指让处在远方的百姓和部族由于对自己国家的政治感到钦佩，愿意归顺和臣服。这是儒家“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仁政思想的具体体现。它告诉人们，要想做到“柔远怀来”，除了德政，专靠武力绝对不会达到目的。九是怀诸侯。所谓怀诸侯，即让别的国家对本国的德政怀恋，并愿意保持良好的友谊。贯彻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不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是对那些战争狂人，侵略成性的疯子以及内部的暴乱分子是个例外。因为对于这些人，要想制止他们作恶，除了诉诸武力，没有别的途径可以选择。在这里，有识之士都不会同意宋襄公的蠢猪式的仁义。